



高等院校宋史专业研究生教材

宋学讲习概论

吕变庭 张 婷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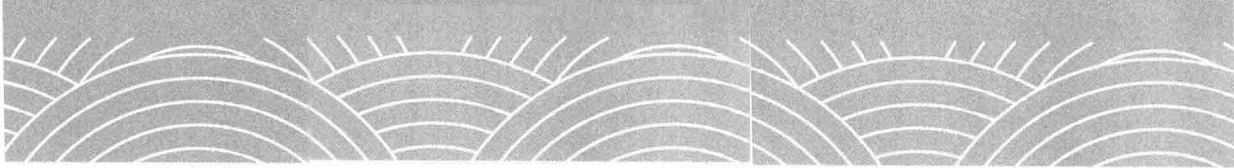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本书得到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高等院校宋史专业研究生教材

宋学讲习概论

吕变庭 张 婷 / 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宋学讲习概论》原是为研究生开设《宋学》课的讲义，后经不断修改和完善而成。全书共 6 讲，分“萌动期”“形成与发展期”和“演变期”三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对应北宋，“演变期”则对应南宋，此时学术发展的主要倾向渐趋“内在”和“保守”。由于本教材是供宋史专业的研究生之用，故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和问题可以继续争论，实际上，只有相互切磋，相互砥砺，宋学的研究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宋学这门课程才能不断焕发其生机和活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学讲习概论 / 吕变庭，张婷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6
高等院校宋史专业研究生教材
ISBN 978-7-03-049250-0

I. ①宋… II. ①吕… ②张…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研究生—教材
IV. ①K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7878 号

责任编辑：杨 静 陈 亮 / 责任校对：郭瑞芝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左 讯

编辑部电话：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志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字数：296 000

定价：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讲 宋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初探	/ 1
一、赵普的治国理念与“道无为”命题：天下理最大	/ 1
二、宋学筑基阶段的时政要点与图解	/ 3
第二讲 宋学的形成与发展	/ 25
一、宋学形成与发展阶段的内容概要	/ 25
二、区域文化格局的重新整合及其学术特色	/ 34
第三讲 宋学发展时期的诸家学派概述之一	/ 40
一、胡瑗与安定学案	/ 40
二、孙复与泰山学派	/ 51
三、范仲淹与高平学派	/ 58
第四讲 宋学发展时期的诸家学派概述之二	/ 70
一、周敦颐与濂溪学派	/ 70
二、张载与关学	/ 93
三、洛学与二程理学的要义	/ 99
四、荆公新学概述	/ 122

五、司马光与涑水学派	/ 128
第五讲 宋学发展时期的诸家学派概述之三	/ 144
一、邵雍与百源学派	/ 144
二、欧阳修与庐陵学派	/ 151
三、二苏与蜀学学派	/ 158
第六讲 宋学发展时期的诸家学派概述之四	/ 173
一、胡宏与五峰学派	/ 173
二、朱熹与闽学	/ 187
三、陆九渊与象山学派	/ 248
四、陈亮、叶适与事功学派	/ 258

第一讲

宋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初探

邓广铭先生有两篇专论“宋学”的文章，一篇是《略谈宋学》，收录在《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另一篇是《论宋学的博大精深——北宋篇》，收录在《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中。在第一篇文章中，邓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①据夏君虞先生考证，“宋学”在古代有两个：一个是战国时代的墨学，因墨子是当时的宋国人，故后世将他的学说称为“宋学”，但人们更多的是将其称为“墨学”；另一个是宋代学术，就是宋代以义理学为特征的学术思想。本书所讲的宋学，是指宋代的学术。当然，对于理学之外的功利学以及杂学等，亦略有论及。

本讲义依漆侠对宋学的划分法，将宋学的历史发展分成“萌动期”、“形成与发展期”以及“演变期”三个阶段。

一、赵普的治国理念与“道无为”命题：天下理最大

赵普（922—992年），洛阳人（图1-1），是宋朝初期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和学术思想家，官至枢密使。赵普不仅帮宋太祖策划了“陈桥兵变”，制定“先南后北”方略，而且更向宋太祖献计，布置了天下第一酒局——“杯酒释兵权”，使国家政权由分权向集权转变。《宋史全文》本转载其事如下。

（1）先南后北战略。“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

^① 《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65页。



图 1-1 赵普像

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茵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时为北汉所据）。’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①这就是著名的“雪夜定策”。

（2）崇文重才，忍辱负重。开宝五年（972年）八月，“普独相凡十年，沈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倚信，故普得成其功。尝欲除某人为某官，帝不用；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于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之。上悟，乃可其奏，后果以称职闻。又有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普力请与之。上怒曰：‘朕故不与迁官，将奈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弗听，起，普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良久不去。上卒从其请”^②。

（3）天下理最大。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奏：‘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③

① 《宋史全文》卷2《宋太祖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58页。

② 《宋史全文》卷2《宋太祖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③ 《宋史全文》卷25上《宋孝宗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0页。

以上三件事与宋学关系比较密切。赵普不是学者，但在宋学的筑基阶段，他起到了文人学者所起不到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即政治化学术，所以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誓约，似跟赵普有割不断的联系。尤其是“天下理最大”的命题不仅开启了宋代波澜壮阔的“求理”时代潮流，而且成为宋代“理学”血脉相承的一根思想轴线，意义巨大。从这层意义上讲，没有赵普就没有后来宋学的繁荣，亦就不会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关于赵普与宋初政治的复杂关系，则另当别论。

此外，关于宋初佛学家对宋学形成的重要影响，请参见漆侠的《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编第四章，兹不赘述。

二、宋学筑基阶段的时政要点与图解

（一）北宋开国约 50 年独步一时的文化面相

北宋开国初期时政要点，如图 1-2 所示。

（二）“图解”表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提示

1. 五代十国与北宋初期的文化整合

在政治上，五代十国没有可特别称道之处，然而，对于北宋学术发展而言，五代十国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了直观起见，我们不妨先移过来一张“五代十国形势图”（图 1-3），然后看看北宋学术流派的兴起与发展和“五代十国”的区域对应关系。

无论《宋元学案》抑或《宋学概要》还是其他讲解宋代的著作，人们习惯于用特定区域来命名宋代的学术流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学。其核心人物张载系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他一生讲学关中，学生又多是关中人，故人们把他所创立的学术流派称作关学。当时，该区域先后为后梁及后唐的属地。后梁时，关中之地为李茂贞所据。不久，其地为后唐所取。

（2）洛学。其核心人物二程为洛阳人，他们后来讲学亦在洛阳，所以人们把以二程为首的学术流派称作洛学，同关学的朝代变化一样。

（3）蜀学。以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为代表，三苏为四川人，故人们把三苏所创的学术流派称作蜀学，地方特色非常鲜明。当时，四川先后为前蜀、后唐及后蜀等政权所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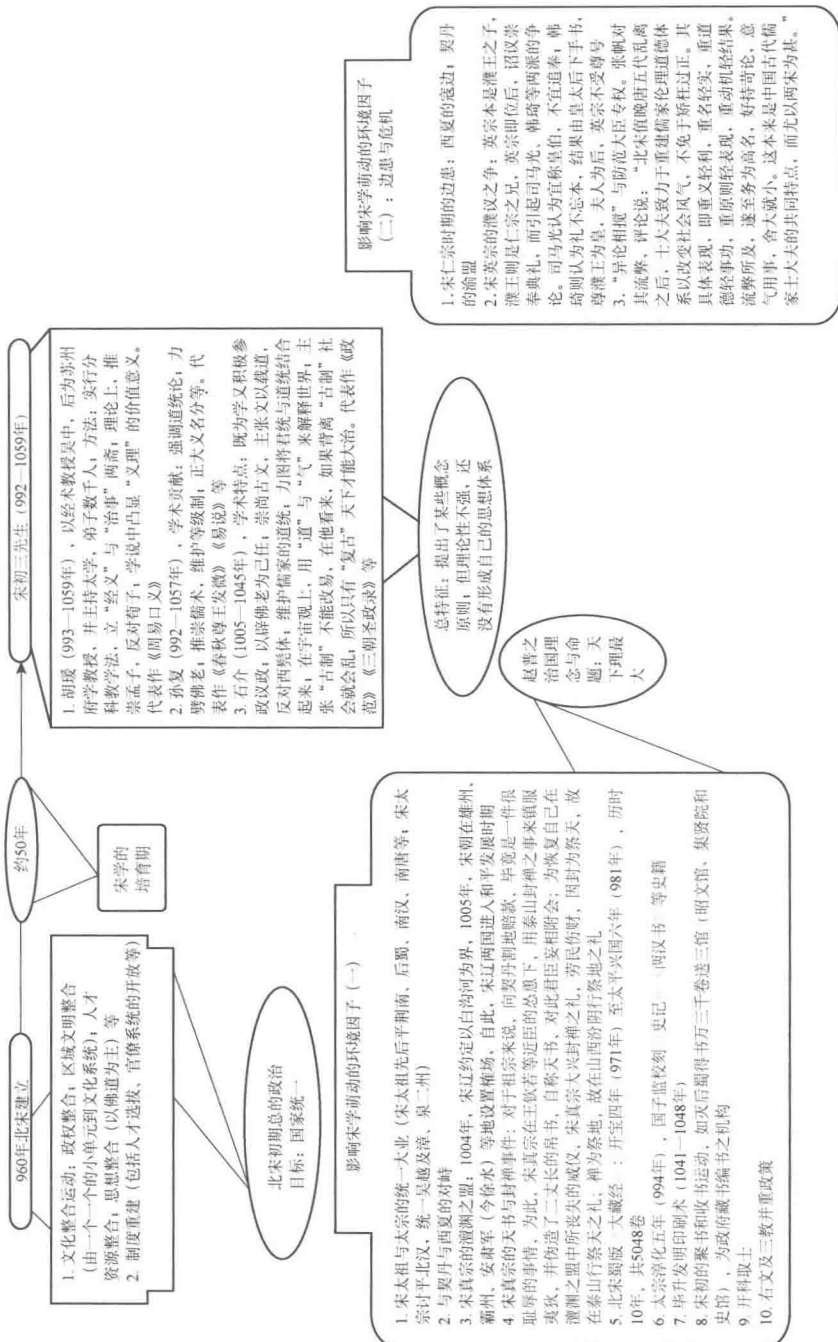


图 1-2 北宋开国初期时政要点图



图 1-3 五代十国图（以 943 年为准）

资料来源：陈洪斌编：《中国万年史》，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第 352 页

(4) 朔学。以司马光为代表，因为司马光为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当时，朔州先后为后晋及后汉等政权所统治。

(5) 闽学。以朱熹为代表，朱熹生于福建尤溪郑氏草堂。五代十国时，福建为闽国所统治。

(6) 江西学派。以欧阳修、李觏、王安石、陆九渊等为代表，他们都生于江西，是宋学中阵容最强大、思想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学术流派。五代时，此地曾为吴及南唐所统治。

(7) 湖湘学派。以福建崇安的胡氏父子（胡安国和胡宏）为代表，他们因在潭州湘潭创建碧泉书院以及在衡山山麓开文定书院，吸纳了众多湖湘士人，兼容并蓄，留心经济，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共同构建了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南宋地域性道学流派。五代十国时，此地为楚国所统治。

(8) 浙学。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强调事功，包括金华、永嘉、永康等诸地的事功学派。因此，学界比较普遍认为“浙学”并不是一个学

派的单一的称谓，而是表示具有浙地之学或浙人之学这种地域性特点的多个学派、学说的统称”^①。五代时，此地为吴越国所统治。

(9) 濂学。以北宋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为代表。《广湖南考古略》道州“安定山”条下述：“安定山，在州西，俗名安心寨山。濂溪出其下，壁镌‘道山’二大字。山下石窦出泉，即濂溪也，人呼为圣脉泉。”^②五代十国时，此地为楚国所统治。

五代十国对宋代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思想的传承，如陈抟与周敦颐和邵雍的关系；二是学术资源的积累，如图书资料的集中等。

就宋代整个学术发展的历史特点看，最精华的思想集中在两个三角区域。按照历史进程，北宋初期和中期，以关学、朔学和洛学围成的三角区域，学术思想最为发达；金灭北宋之后，随着宋学的南移，出现了北方衰落、东南高涨的发展态势。终南宋一代，以闽学、江西学派和浙学围成的三角区域，成为擎起宋学高高在上的石基，其中尤以朱熹的思想最为聚光。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③

学习宋学，应特别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一”与“多”的关系，即宋代学术虽然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但是就每个学派自身的发展状况而言，由于人才的频繁流动，往往是一个区域文化与另一个、另两个甚或更多个区域文化的相互交汇、融合和凝练。例如，闽学的主导思想是洛学，但又广泛吸收了关学、濂学、湘学及浙学等其他区域学术的思想精髓。又如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④

就每一学术流派的思想内容而言，不是纯粹的和单一的思想汇总，而

① 朱晓鹏：《传统思想的现代维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② 同德斋主人编：《湖湘文库（甲编）广湖南考古略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0页。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审查报告》，《三松堂全集》第3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0页。

④ 《宋史》卷427《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3页。

是包括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及科学等多学科的相互渗透，所以坚持多样性统一的原则，是学习宋学的基本方法。

第二，区域与全局的关系。文化的区域性与全局性的关系，是研究宋代学术的一个基本方面。首先，学术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或群体来作为主体，而一定的人或群体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空间里，他们必然与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构成一种“区域学术生态”，并形成反映这种“区域学术生态”的思想特色。但是，学术又是被放大的政治，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政权管理。需要注意的是，政权管理是一个多面体，具有多面性和可变性。例如，张载的祖上居大梁（今开封），大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都，五代时为后梁所属。换言之，关学的活动空间在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及后唐所治，这两种国家政权以一种惯性力量对关学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和作用，这就是一种区域与全局的关系。后来北宋统一了后唐，关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服从于北宋国家政治的管理。其次，张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①，也体现了张载学术的区域特色。故《宋史·张载传》论述张载的学术思想时说：“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②其中“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即是一种文化的重新洗牌和整合，具体方法是用“今礼”规范和校正先前的旧的“昏丧葬祭”，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处理区域文化与属于国家政治这个全局文化的相互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矛盾关系，而区域服从大局则是这个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

在读书方面，应把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和朱瑞熙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宋代区域文化与全局文化的辩证关系非常有帮助。

第三，文化传统与思想创新的关系。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割裂传统，事实上也无法与传统彻底决裂，只是因每个学者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受传统影响多一点，有的受传统影响少一点，而一点儿也不受传统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对于今天，宋代学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加强烈和深刻。还以张载为例，“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所谓“用先王之意”即是文化的传统，而“傅以今礼”则是文化传统中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即是一种新的东西，用现代的词语讲就是“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灵魂，没有创新，学术就失去了生命力。然而，如何创新？这

① 《宋史》卷427《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4页。

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去细讲。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学术创新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创新的本质是对传统的变革，或者说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包括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如程颐评论张载的思想特色时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①又如，王安石的新学更突出了学术的创新原则，因而在宋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界，一般理解的“学术创新”是指质疑传统，并从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推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张载通过梳理前人的思想，发现“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因此，他“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②。像伏羲、黄帝、周公等都是“圣人”，如伏羲（《史记·太史公自序》持此观点）或周公作易，虽然“易”的境界既在人又在天，但相比较，“则天”或云“法天”更重要。《周易·系辞上》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实际上，“八卦”反映的是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在这里“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理解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本质或规律。从这个角度讲，张载把“气”而不是“理”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他的“圣人”主张相一致。后来学界给张载站队，将他排在了“唯物主义”的阵营里，有学者主张张载不是理学家，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保守传统重于文化创新，不能与时俱进，这样往往会影响甚或局限其学术思想的传播，容易为后学所抛弃。例如，张载“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③，是不是张载被气病了，不敢妄说。但他由于“学古力行”，不合时宜，与众人难以共处，精神抑郁肯定是其生病的主要原因。又如，张载“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④，从“宗法”的角度对现实社会的各种行为进行规范，体现了张载学术的“致用”性，但是用“复古”的形式来操作这件事情，能够理解他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张载学术后继乏人。司马光、苏轼等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类问题，他们的学说之所以不为当时大多数政客所接受和认可，与此有直接关系。而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

① 《宋史》卷427《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5页。

② 《宋史》卷427《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4页。

③ 《宋史》卷427《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5页。

④ 《宋史》卷427《道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4页。

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两种学术理念的纠结与博弈。二是文化创新重于保守传统，如宋初三先生与佛教，表现得最为突出。佛教究竟对宋代统治有利还是无利？这个问题本来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显而易见。可是，石介和欧阳修等视佛教如饕寇，恨不得将佛教活剥活埋掉，这不是历史的态度，而社会现实也跟他们想的和说的不一样，甚至与他们当初的愿望相反。我们不妨举一个稍微极端一点的史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载：乾德四年（966年）四月，“河南府进士李霭，决杖配沙门岛。霭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又辑佛书缀为衾裯，为僧所诉。河南尹表其事，故流窜焉”^①。“衾裯”是一种单层被子，把佛书撕下来做成被子盖，这是一种极端不尊重宋代文化传统的行为，伤害了无数信仰佛教民众的情感，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宋朝统治者将其绳之以法，用刑法来遏制这种极端行为的继续发生，很有必要。

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中国化，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许多积极的思想成果，以丰富自己，因此完全否定佛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做法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所以他们的思想很快被“三教合一”取代。

第四，学术个性与学术共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可理解为学术的研究风格与时代特色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审视宋代的学术流派时，一方面要关注其不同于其他学术流派的研究特点和思想风格，同时又必须把握其学术风格与时代特色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讲到“存天理、灭人欲”就会想到朱熹，讲到“太极图”就会想到周敦颐，讲到“安乐窝”和“象数学”就会想到邵雍，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会想到范仲淹，讲到“心即理”命题马上就会想到陆九渊，讲到“功利”思想就会想到浙学，等等。这些极富个性的学术思想，深入人心，熠熠生辉。宋代之所以是一个“文化造极”的时代，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产生了那么多鲜活的学术型生命个体以及在他们身上飘逸着无限柔美，即使“暗淡时光”也遮掩不住的学术风采。宋代学术就是如此让人惊羡不已，回味无穷。严复说得好：“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②虽然此言是从“人心风俗”的层面来说的，但是对“中国今日现象”能够影响到“什八九”的程度，已经是一个很不得了

① 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四月”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② 严复：《严复集》第3册《致熊纯如函》，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

的文化奇迹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什八九”为“宋人之所造就”，我们干脆把今日社会称为“宋型社会”不就得了。然而不行，因为宋代学术还有另一面，即其“时代特色”。也就是说，宋代学术符合宋代历史的发展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无论是二程、苏轼，还是朱熹和陆九渊，他们尽管学术个性不同，差异明显，但是从整个时代特色来考量，他们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

首先，他们都是“君主制”的思想产物，“忠君”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共性。以范仲淹的“先天下”观为例，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一种“民本”思想，笔者提出了不同认识，认为它不是“民本”，而是一种“君本”思想。^①我们知道，“民本”与“君本”是相反、否定的，坚持“民本”必然会否定“君本”，反之，坚持“君本”就必然否定“民本”，两者是不能调和的。如果范仲淹的“先天下”观是一种“民本”思想，那么，它能够用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建设，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党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以民为本。然而，真要把范仲淹的“先天下”思想拿过来，麻烦可就大了。例如，范仲淹说：统治者“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惰”^②。又说“帝者民之宗焉”^③，等等。在范仲淹看来，帝王就像驱使自己的四肢一样，可以任意驱使民众为其效“忠”。这种“君贵民轻”的思想与真正的“民本”思想相差较大，两者不是一回事。总之，范仲淹的学术思想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和观念特色，因此，从本质上看，他的思想是为封建君主制度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其次，宋代学术的整个思想基础是阴阳对立，阳尊阴卑贯穿于宋代每个思想家的大脑神经。笔者认为，宋代是士大夫的天堂，却是妇女的人间地狱。虽然宋代妇女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普遍降低。唐代有个武则天，宋代则有个潘金莲。潘金莲是整个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牺牲品，具有典型意义。由于身份卑贱等种种原因，潘金莲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爱的人，但她有一种反叛心理，大胆地追求“所爱”，可是，宋代士大夫尤其是朱熹却给她们带上了“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在法律上，男子可以“出妻”，出妻的理由是：“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④而妻子只能为丈夫“守贞”，主张“终身不改，故

① 吕变庭：《范仲淹的“先天下”观是一种“民本”思想吗？》，《党史博采》2005年第6期。

② 范仲淹：《君以民为体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③ 范仲淹：《尧舜帅天下以仁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68《范仲淹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④ 《大戴礼记》卷13《本命》；《唐律·户婚》规定：“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夫死不嫁”，乃“妇德也”。^①这是很不公平的。不是武大郎，而是士大夫的精神枷锁窒息了潘金莲的美丽生命。“一个民族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②可惜，这朵本该绚丽盛开的“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在宋代却出现了凋谢。有人说“宋代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是“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③，笔者则加上一个条件：“宋代是一个不完整的和有严重阙失的文明社会。”有人想为宋代女性的悲惨境况翻案，认为宋代是妇女“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④，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赞同张邦伟先生的说法：“整个传统时代都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宋一带概莫能外。这一成说只怕很难颠覆。”^⑤

第五，兴与衰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有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衰亡的过程，宋代的学术流派亦一样。只不过有的衰亡早，有的衰亡晚而已。如“关学”在宋代就衰亡了，而程朱理学兴盛于元明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被推翻，其思想学说也随之衰亡。而把宋代学术作为一个整体看，明清之际的乾嘉学派兴起之后，宋代学术就开始衰落了。这个问题此处不赘述。

2. “天下理最大”：务实与务虚的矛盾

赵普是一个政治家^⑥，但他为宋代学术发展提出了一个理论命题：“天下理最大”。然而，究竟什么是“理”？赵普没有直接回答。不过，通过以下几点，我们大致能够猜出这个理论命题的主要内涵。

1) “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历史故事，据《鹤林玉露》卷7载：

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

① 《礼记·郊特牲》。

②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③ 萧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的伟大与消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④ 萧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的伟大与消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⑤ 张邦伟：《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⑥ 根据张其凡考证，赵普在宋代有四种文集，惜已不传（见《赵普著述考》，张其凡：《宋代人物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1页）。

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①

故事的真实性，笔者是半信半疑。现在的问题是：南宋的罗大经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故事。金泽灿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参见《那些回不去的历史“真相”》一书（第223—225页）。《论语》在唐代被视为少儿之书，属于低级智力时期的读物。如众所知，赵普曾在五代时期的滁州乡下当过私塾教师，对《论语》的内容相对熟练。谁也没有想到，只有小学一年级水平的赵普，竟然做到了宰相的官位，辅助皇帝治理天下。这在唐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在宋代却变成了现实。那么，《论语》对于治国究竟有没有实际意义呢？赵普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宋史》本传云：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权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篋（qiè）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hōng），家人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②

“家人发篋”不单单是看到了《论语》二十篇，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赵普治国的秘密。这个秘密的解开，实际上是为宋代统治者出了一道算题：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里，究竟是“多”大于“一”，还是“一”大于“多”？“一”就是“一元”，“多”就是“多元”。在古代中国，上述两种情形都曾出现过，作为一种政治公式也都能够成立。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曾开创了独步千秋的历史功业，为后人称道；反过来，唐朝实行“三教并存”，也开创了星汉灿烂的盛唐局面。如众所知，五代十国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造成的直接后果，这种后果破坏了儒家的基础，可谓礼崩乐坏。那么，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儒家的礼制和道德权威，对宋初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赵普高瞻远瞩，看到了儒家思想对宋朝的深远政治意义。很显然，夺天下时，不能用儒家思想，道教比儒教更有力；治天下时，不能用道家思想，例如，汉初推行黄老政治路线，没有走通；北宋初年也想走黄老政治路线，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佛教治国也不适合宋朝，因为佛教讲男女平等；宋人认为武则天的出现，与唐朝奉佛教为主的国家政治有关，宋初三先生批判佛教最狠，原因就在于此。《论语》讲三纲五常，讲男女有别，讲夏夷之辨，讲学而优则仕，等等，非常适合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如上所述，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这就决定了他的思维重实用，即从实用的角度选择治国理论。但由于其自身

① 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卷1乙编《论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页。

② 《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40页。